

中古世家大族 清河崔氏研究

夏炎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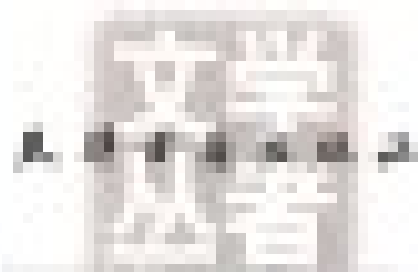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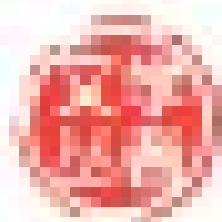
文学丛

XUE ZHE WEN CONG

中古世家大族

清河崔氏研究

趙世瑜



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

ZHONG GU SHI JIA DA ZU QING HE CUI SHI YAN JIU

夏 炎 /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夏炎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8

(学者文丛)

ISBN 7-80696-095-3

I. 中... II. 夏... III. 氏族谱系, 崔氏—研究—山东省—古代 IV. K8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2703 号

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

夏炎/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蓟州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7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696-095-3

定价: 21.00 元

序

中古士族是一个很受关注的课题。士族门阀始于魏晋，盛于南北朝，而终衰于隋唐。唐朝人所谓名门或者高门，又称旧族，乃是指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其中尤以所谓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王诸家最有盛名。论者大多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朴素感情甚或“义愤”，对其持贬斥的态度，比如说腐朽的士族云云，这与当年唐太宗的态度很相似。因为，这些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是最显赫的，经济上也不是最富有的，但是，在门第上却被认为是最高的。对此，唐太宗十分不满，《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说：

比有山东崔、卢、李、郑西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所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需改革。^①

唐太宗的这段话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打出了恢复“礼经”的旗号；第二，他提出了“理需改革”的要求。他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则是下令重新编定氏族等级。“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尚书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从主持这项工作的大

^①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

臣来看，都属于唐朝主管人事、监察、决策和礼仪等方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其中如渤海高氏、城南韦氏以及令狐氏也都属于名门望族，只有岑文本是普通庶族。不幸的是，“士廉等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为第一等”。这些人都推山东士族崔氏为第一，的确很耐人寻味！这说明朝廷公卿和民间都公认山东士族的门第最高。为此，唐太宗既迷惑又愤怒：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楸，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唐太宗自己提出衡量门第高下的标准是：

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以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幹）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朝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①

按照这个标准编写《氏族志》后，皇帝之家被列为第一等，太宗下诏说：“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太宗虽然一再强调人伦（礼仪）名教，却把礼仪名教混同于冠冕。在他看来，失去官爵者也失去了礼仪名教，当朝为官者也就有了礼仪名教。实在是毫无道理！用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行自己另有图谋的政治主张历来是当权者的一种高明的政治技巧。唐太宗的本意是要加强新建朝廷的政治权威，打击旧的政治势力的“气势”，但是，他却挂羊斗卖狗肉，采取了维护仁义和名教的说法。

其实，北朝的士族乃以礼法而著名，可以说是礼法文化的代

①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

表。而帮助唐太宗打天下的那些以关中军功贵族为核心的新朝权贵，倒是比较缺乏礼法文化的底蕴。李唐皇室在婚姻上不讲礼法的糊涂账姑且勿论，在北朝，“北齐崔陵一门皆衣冠美族，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陵妹为妃，敕操办婚事的中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①由此可见，礼法文化正是这些士族受到包括皇室在内的人尊敬的原因。公孙表的儿子轨娶渤海封氏女为妻，生儿子睿，睿之妻为崔浩弟女。睿的堂兄公孙邃的母亲是雁门李氏，地望悬隔。“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②。所以，当时人说：士大夫当需好婚亲。”^③显然，这里的士庶之异，乃是在吉凶会集之时，由于受到不同的礼法门风的熏陶所表现出的在吉凶礼仪上举止的差异。

究竟是山东氏族不讲礼法名教，还是被列为氏族第一的李氏皇族缺乏礼法文化呢？一二百年后唐太宗的后代做了最好的回答。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④宣宗为公主求婚于士族，发现公主漠视小叔子患病，也不回家侍候婆婆，提出了批评。还有一位待嫁于士族家的小公主吃饭时发脾气折筷子，被宣宗皇帝大加呵斥，并且决定换上另外一位性情温顺的公主出嫁。这些情况都表明，唐太宗的后裔们已经用主动向士族求婚的做法，证明了唐太宗当初批评山东士族不讲礼法文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通过上面这几个例子，我想说明，对于山东崔卢等士族的历史表现和历史地位，还有很多值得探讨和发掘的内容！古代的普通劳动人民诚然为祖国的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只有“泥腿子”才是最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古士族同样也是

① 《北齐书》卷二三《崔陵传》。

② 《北史》卷二七《公孙表传》。

③ 《北史》卷二七《公孙表传》。

④ 《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附从弟羔传》。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作为中古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保存者理应得到承认！随着历史的发展，士庶通婚的界限被金钱、官职等打破之后，士族高门用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拥有金钱和政治地位的新富新贵进行交换，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的背后其实是社会上对于士族的价值观、伦理观等所谓礼法文化的认同。士族的价值观由此而向整个社会普及，礼法文化因之而扩大了其传播范围。过去的学术史论及宋明理学，总会追索到韩愈、李翱的思想，但是，如果理学诞生的社会基础不从中古士族的礼法文化中去探讨，那么我们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就真的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反映的就是士族文化逐渐为大众社会所接受的历史趋势，它构成了中古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中古士族及其礼法文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庞大的历史课题，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总体相结合，对中古士族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应该说也属于这种研究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夏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勤奋好学，酷爱历史学科。他花了五年多的时间爬梳资料，潜心研究这个题目，终于成书。书中对于清河崔氏谱系的钩沉索隐，以及对其家传文化的深入探讨，都取得了灼然可观的成绩，丰富了人们对中古士族的认识。该书付印在即，夏君向我索序。对于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来说，能够有这样的一部著作出版，确实令人欣慰。故乐为之序，聊表祝贺之意云。

张 国 刚

2004年2月28日于

日本东京早稻田

目 录

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

| | |
|--------------------------------------|-----|
| 引 言 | 1 |
| 第一章 崔氏溯源 | 12 |
| 第一节 姓氏、郡望与世家大族 | 12 |
| 第二节 姓氏研究资料 | 18 |
| 第三节 崔氏源流 | 21 |
| 第四节 先秦时期的崔氏 | 29 |
| 第二章 清河崔氏大族的形成 | 37 |
| 第一节 清河崔氏的始祖 | 37 |
|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清河崔氏 | 39 |
| 第三节 清河崔氏世家大族的形成 | 48 |
| 第四节 再论崔琰之死问题 | 55 |
| 第三章 清河崔氏与十六国南北朝政治 | 60 |
| 第一节 主要支系在十六国南北朝发展概况 | 61 |
| 第二节 家族地位至上观念的凸显——十六国中的 清河崔氏 | 76 |
| 第三节 家族发展的高峰——清河崔氏与北朝政治 | 82 |
| 第四节 独特的政治履历——南朝的清河崔氏 | 97 |
| 第四章 隋唐清河崔氏地位的新变化 | 107 |
| 第一节 仕宦品级与政治地位 | 108 |
| 第二节 官修氏族谱的修撰对清河崔氏的影响 | 116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兴起对清河崔氏的影响 | 122 |

| | |
|-------------------------------------|-----|
| 第五章 清河崔氏各房支与隋唐政治（上） | 128 |
| 第一节 郑州崔氏主要房支 | 129 |
| 第二节 许州鄆陵房崔枢一支 | 144 |
| 第三节 南祖崔氏崔悬解一支 | 156 |
| 第四节 南祖崔氏旁支 | 191 |
| 第六章 清河崔氏各房支与隋唐政治（下） | 201 |
| 第一节 清河大房主要房支 | 201 |
| 第二节 烜赫的清河小房（一）——崔玄览一支 | 222 |
| 第三节 烜赫的清河小房（二）——崔玄弼一支 | 245 |
| 第四节 清河青州房 | 261 |
| 第七章 清河崔氏的婚姻关系 | 268 |
| 第一节 婚姻关系的政治性——南北朝清河崔氏 婚姻关系 | 269 |
| 第二节 政治婚姻的再次抬头——隋唐清河崔氏 婚姻关系 | 287 |
| 第三节 非政治性婚姻因素 | 317 |
| 第八章 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 | 322 |
| 第一节 数代好学与学术传统 | 323 |
| 第二节 形式多样的家学 | 331 |
| 第三节 家传文化中的佛教因素 | 335 |
| 第四节 家传思想中的孝悌观念 | 339 |
| 第五节 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 | 344 |
| 第六节 家传文化的特征 | 350 |
| 余论——中古清河崔氏的社会地位 | 353 |
| 主要参考文献 | 360 |
| 附录一 本书图表目录 | 369 |
| 附录二 本书所用墓志资料 | 371 |
| 后 记 | 385 |

引 言

关于姓氏的最新统计显示，崔姓为当代人口最多的 80 大姓之一，为全国第 74 大姓，在山东和东北地区最有影响。当代崔姓的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 0.28%，即每 10000 个中国人中姓崔的至少有 28 人，总人口大约在 340 万^①。许慎《说文解字》曰：“崔，大高也。”崔姓在现代属于大姓，同样，在中古时代^②，崔氏家族也如崔字的本意那样，曾经是一个支脉繁杂、成员众多、声名煊赫的大家族。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清河、博陵两支为代表的崔氏家族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世家大族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古时期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清河崔氏正是这一时期众多煊赫家族中的一员。它形成于魏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发展，至北朝达到鼎盛，成为与博陵崔氏齐名的

① 袁义达、张诚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版，第 113—114 页。

② 本文采用的“中古”一词是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毛汉光先生在其《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序》中认为：“本书所谓‘中古’，是指东汉献帝建安至唐昭宗天祐年间（197—906）。”并说明了“取这七个世纪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一、汉魏之际是一个变革期，许多人物在这段时期升降，唐末五代又是一个变革期，既存的门第在这时期消融，根据本书总论第二篇《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的统计表；二、如果将这 700 年分为 27 个代，则士族自汉魏上升以来，在统治阶层皆占 50% 以上，至后唐时才降至 50% 以下，士族不仅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在政治方面亦占各期高级官吏之绝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七个世纪属于同一个社会架构，朝代之更替似乎是换汤不换药，因此社会史的分期并不等于朝代之更替，以同一个社会架构作为研究社会史的大段落，则有其基本上的共同性。”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第 5 页。笔者采纳了这种观点。

两支崔氏大族。进入隋唐，崔氏仍保持着其旺盛的发展势头，唐人柳芳云：“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①可见，崔氏家族至唐朝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河崔氏的兴衰与整个中古时期相始终，因此通过对清河崔氏这个家族进行个案研究便可以透视出中古历史发展的某些脉络。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是有一定意义的。

个案研究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将个案研究运用于史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可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界关于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下半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主要是王伊同著《五朝门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8 年重刊第 1 版）与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国外学者亦对此课题产生了兴趣，谷川道雄、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川胜义雄等日本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贵族制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 2002 年 12 月版）在探索中国中世的研究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G. Johnson）著《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77）及长篇论文《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 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与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是欧美史学界关于中古世家大族研究的代表作^②。史学界关于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①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史·柳冲传》。

② 参见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12 期。

兴起的^①，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较突出的论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月版）、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10月版）、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10月版）和王永平《六朝江东世家大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等。

在关于世家大族的各项研究中，从研究时间划分，中古世家大族的研究遍及整个中古时代，研究的热点分别集中在东晋南朝、北朝及唐代；从研究的专题划分，涉及经济、政治、婚姻、文化等各个领域；从世家大族的地域上划分，主要包括江东士族、吴姓士族、侨姓士族、青齐士族、齐梁士族等集团的研究；从姓氏上划分，主要包括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鄱陵庾氏、河东裴氏、颍川荀氏、京兆杜氏、河东柳氏、余姚虞氏、江东顾氏等家族的个案研究。对于清河崔氏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涉及。

在整体研究方面，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是从整体上研究中古士族的力作。据毛汉光先生总结：“自魏晋以迄唐末，延绵不绝一直维持强盛的士族，有十姓十三家，即：京兆杜陵韦

^① 参见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士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陈爽：《近年来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

氏、河南开封郑氏、弘农华阴杨氏、博陵安平崔氏、赵郡武城崔氏、赵郡平棘李氏、陇西狄道李氏、太原晋阳王氏、琅邪临沂王氏、范阳涿县卢氏、渤海蓟县高氏、河东闻喜裴氏、彭城刘氏等，任官五品以上者在一百九十九人以下，一百一十八人以上。”^①其中赵郡武城崔氏（即清河崔氏）人数居第三位。因此在整本书的分析中，清河崔氏是重要案例之一。在第七篇《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中，有清河崔氏诸房之分析、唐代清河崔氏禁婚家分析。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分析了清河崔氏著房著支的迁移情况，得出清河崔氏迁徙的“新贯”七个著房支皆在河南府的结论。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总结出唐代清河崔氏 12 位宰相的入仕情况。

霍姆格伦（Jennifer Holmgren）《贵族的形成：五世纪中国东北部的地方政治和社会关系》（“The Making of an Elite: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Century AD.”, 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 30, sept. 1984）是西方学者研究清河崔氏的重要代表文章，通过探讨清河崔氏的家族发展史揭示了唐代东北贵族在五世纪形成的过程中显露的特征。

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 期] 从整体上探讨了清河崔氏在北朝的政治地位、婚姻关系与家族的迁徙。《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 则对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关于崔浩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崔浩国史之狱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主要成果有：

王伊同：《崔浩国书狱释疑》（《清华学报》1957 年新 1 卷 2 期）。

孙同勋：《北魏时期政治的冲突与崔浩之狱》、逯耀东《从北

^① 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第 59 页。

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论崔浩之死》(《新亚学报》1966年7卷2期)。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

陈汉平、陈汉玉:《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周一良:《崔浩国史之狱》(《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莫久愚:《北魏前期政治中的民族问题和崔浩之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3月版)。

许殿玺:《崔浩族诛析》(《全国北朝史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

许殿玺:《再论崔浩》(《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

李培芬:《试论崔浩之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张庆捷:《崔浩之诛》(《文史知识》1992年第4期)。

何兹全:《崔浩之死》(《文史哲》1993年第3期)。

刘国石:《近20年来崔浩之死研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9期)。

张德寿:《拓跋鲜卑统治者的心态与崔浩国史之狱》(《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此外,黎虎的《崔浩军事思想述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则对崔浩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探讨。

涉及其他人物的研究,有柳春新《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陈建华《试论崔国辅的诗》[《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7期]、郑伯勤《崔融诗歌论》(《晋阳学刊》1995年第4期)及张先昌《崔亮生年考》(《北朝研究》1997年第2期)。

在婚姻关系研究方面,刘驰《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是集中探讨

崔氏婚姻关系的文章。赵超《从唐代墓志看士族大姓通婚》(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3月版)、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二章第五节《北魏“四姓”的确立与“五姓”婚姻集团的形成》以及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也涉及到清河崔氏婚姻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考古资料整理方面,主要有: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李献奇、乔栋:《唐崔氏墓志丛识》(《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洛阳考古发掘与研究》)。

李献奇:《唐崔氏墓志续识》(《洛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李献奇:《唐崔谔之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王育龙、程蕊萍:《陕西西安新出土唐代墓志铭五则》(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李森、王瑞霞、董贵胜:《北齐崔頔墓志探考》(《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这些近年来出土的墓志是研究清河崔氏的重要资料。

关于清河崔氏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果,但仍然缺乏对这一煊赫世家大族系统全面的研究。鉴于此,本书力求以动态研究的方法,从整体上入手,以时间为纵线,以各个专题为横线,从追溯崔氏源流开始,对清河崔氏在中古时期的形成、发展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在全书的开篇,首先对姓氏、郡望与世家大族这些在中古家族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对研究姓氏所使用的资料

进行了介绍。关于崔氏源流的追溯，主要探讨了崔氏出自姜姓还是吕姓、崔氏出自炎帝、何时为崔氏等问题，并对先秦时期的崔氏进行了考察。笔者主要是通过比较史料的方法，力求使史实更接近历史真实。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还运用了姓氏学、符号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主要研究的是变化，故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河崔氏在中古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文化传承等三个方面的变化，这是贯穿全文的三大线索。

世家大族作为中古时代的一个特定产物，是通过家族成员几代甚至数十代人的艰辛经营、层层积累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积累是世家大族地位确立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其政治、社会地位的确立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在中古时代，人们对世家大族的评价往往有一个标准，崔氏作为世家大族，“轩冕婚姻为山东冠族旧矣”^①。可见在古人的眼中，“轩冕”与“婚姻”两方面是评价一个家族为世家大族的重要标准。陈寅恪先生指出：“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②在中古时代，政治与婚姻始终是维系世家大族地位的突出方面，因此在以往的世家大族研究中，也比较注重的是“婚”、“宦”二途，即政治与婚姻研究，故本书也把这两方面作为研究的重点加以探讨。

在政治地位方面，中古清河崔氏的发展呈波浪型发展趋势。正如其他世家大族一样，清河崔氏在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地位并不是始终保持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关于清河崔氏的形成，笔者探讨了清河崔氏的始祖以及清河、博陵二崔氏出现的时间，并发现在曹魏崔林、崔琰之后的清河崔氏家族成员的

① x年十月十四日《唐故大理评事博陵崔（元夫）府君墓志铭并序》，见李献奇：《唐崔氏墓志续识》，《洛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82页。

② 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2月版，第76页。